

宋绮云与延安的第一台印刷机

□ 张法民

宋绮云,新中国最小的烈士“小萝卜头”宋振中的父亲。原名宋元培,字复真。1904年出生于江苏省邳县八路乡(今邳州市八路镇)果堂村。1929年8月,宋绮云来到北平,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旁听生。同年12月去国民党杨虎城部队,任《宛南日报》主编。1930年11月,随杨虎城去西安,任《西安日报》编辑主任。1931年,任《西北文化日报》副社长兼总编辑。1935年10月,中共西北特支建立,宋绮云为特支委员,兼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,做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。1939年11月,组织上又派宋绮云到晋西南中条山第四集团军总部,他的公开身份是总部的少将高参,被任命为总部干训班副教育长兼政治教官,后又被委任为总部干训班国民党的特别党部书记。

1937年初,周恩来、叶剑英等完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任务。在将要离开西安的时候,宋绮云去看望周恩来,临走前,周恩来希望他们在西安搞到一套印刷设备。原来,中央来到陕北后,印刷条件很差,文件只能靠刻写蜡纸油印,费时费工还不清楚,石印也不方便。过去对需要铅印的文件,不得不派人冒着生命危险送来西安印刷,印后运输更困难。宋绮云当即表示坚决完成这个任务。

宋绮云回到报社后,找来郭幼和、曹冷泉、杨寅青商量,《西北文化日报》社的设备是属于西安行营和17路军的,送党中央不妥。《西北画报》的全套印刷设备是报社私人集资购买的,因此决定将其包括对开机、铅字、铜模、照相器材等送给延安。

这套印刷设备,是由宋绮云发动报社职工自筹经费让曹冷泉、郭子刚到上海买来的,准备作为《西北文化日报》一旦被封时的备用机。股东们听说要把它送往延安,无不表示拥护。

为了把这套印刷机器顺利地运到延安,宋绮云找来郭子刚商量,决定分两步走:第一步,对报社其他人宣布,为避日机轰炸,将机器运往西安以北的三原县。第二步,再从三原县设法运到延安。

这时的西安,已经和1个月前的西安大不相同。国

民党的有关机关也在恢复,白色恐怖的阴影已经笼罩着西安古城。政治上极为敏感的宋绮云,当然更为清楚,他们的报社对门是西安军警督察队,西邻是国民党的《西京日报》社,东面是国民党党部设立的刺探《西北文化日报》动静的饭馆,三面监视,出路只有报社后面编辑部东边的一处民宅。要把机器运出去,首先就得设法得到住户的配合。

他问郭子刚:“那个住户怎么样?可能会有什么麻烦?”

郭子刚考虑了一下说:“我看没有问题,过去我曾经在他家住过,关系亦好,人也正直,这事由我去说。”

一切准备就绪之后,宋绮云就与红军驻云阳办事处主任彭嘉伦取得联系。根据约定时间,彭嘉伦派人开车至西安盐店街等候。

1937年1月30日晚上,宋绮云派印刷组长杨勇喜负责拆卸印刷机,由郭子刚带领姬景光、王复元、肖立章、郭日高、何爱祥等有一定觉悟的工人翻墙过去,先将两副半铅字一盘一盘的端出来,递到墙头外面,待印刷机卸完之后,再从墙头搬出来,经过广济街巷子再把它运到盐店街。雨天路滑,工人们满身污泥,一直搬运了几个小时,完成了装车任务。延安来的同志对报社工人的支持甚为感激。

宋绮云考虑到光有印刷机还不行,为了尽快使机器投入工作,他动员了政治上可靠,技术优秀的党志英(原名党应孝)、唐永谦、胡文伯、李广元、刘清玉和工作人员李蔚然、姜尽如、张桂华一同前往,并委托李蔚然带队,随印刷机同到三原。

印刷机器运到三原后,安放在城隍庙街一处房子里。试机排印了《中国革命向何处去》一书。到了3月,才又将机器运往延安,安放在东关外万佛洞《解放日报》社。此时,周恩来已从西安回到延安,他把印刷设备的事,告之有关人员。财政部长林伯渠、《解放日报》社社长祝志澄等前来欢迎同车到达的16位技术人员。从此,《解放日报》由石印改为铅印,每日出版对开一大张。中央首长十分重视,毛主席、周恩来、博古、丁玲及吴亮平等



南梁红色故事

1935年11月3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为两路行动。一路由张闻天、博古、邓发等率领中央机关北上进驻陕甘根据地机关驻地瓦窑堡;一路由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彭德怀率中央红军主力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,进行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“围剿”的作战。11月上旬,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,接管陕甘晋省委保卫局。党务委员会经过调查审理,认为“左”倾错误的执行者在案件里列举的刘志丹等人的“罪状”都是不能成立的。“经过再三审查,证明所谓‘口供’中,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,蓄谋破坏外,其余都是逼、供、信所造成的结果。”随即释放了错误肃反中被冤屈的刘志丹等领导人,接着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指战员。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于11月18日在富县张村驿专门致电张闻天、博古,请他们详加考虑陕甘肃反中的问题,毛泽东肯定地指出:“错捕有一批人,定系事实。”提出要纠正肃反的错误。

11月26日,中共中央作出关于《西北中央局审查“肃反”工作的决定》,指出:“中共陕甘晋省委个别领导人在‘肃反’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‘极左主义’和‘疯狂病’的严重错误,“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,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”。

11月30日,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,为刘志丹、习仲勋等平反。刘志丹、高岗、杨琪、杨森等被释放的干部也出席了会议。会议宣布了《西北中央局审查“肃反”工作的决定》,正式宣布给刘志丹、习仲勋、张秀山等人平反;还宣布了党中央对戴季英、聂洪钧的处分决定。复出后的刘志丹随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,并先后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驻西北办事处副主任(主任为周恩来)、瓦窑堡警备司令、红二十八军军长。考虑到西征战役前线地方工作的重要性,习仲勋被派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,原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担任延安县委组织部部长,原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担任三边独立营营长,张策任中央党校白区工作班主任,红三团政委兼团长黄罗斌先分到陕北省军事部工作,后调任定(边)榆(林)横(山)游击司令。出狱后的陕甘苏区干部大都辛勤为党工作着,也有一些同志对肃反遭到的迫害有怨气,要求继续处理那些制造错案的人。刘志丹从大局出发,耐心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:“不要着急么,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分清是非,做出正确的结论。”在向部队讲话时,他强调指出:“革命利益高于一切,要识大体顾大局。要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,听从中央调遣,要向中央红军学习,要加强团结。”

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制止了错误肃反,保护了刘志丹、习仲勋等一大批党的好干部,保护了陕甘根据地和陕甘红军。习仲勋后来讲:“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,挽救了陕北革命,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。”

(文章选自《南梁红色故事》·连载下)

毛主席来了晴了天

□ 马啸

温润奇绝的清代梅花玉茶盏

□ 卜庆萍



我收藏的清代梅花玉茶盏,高7.2厘米,宽6.5厘米。下有底盘,上有圆盖。整个盏面,黛青的底色上布满了绛紫色连枝梅花。其天然的梅,疏影淡相宜,清逸飘洒自如,一幅上天赐予的美奂佳图,可谓天功神奇,轻撇一眼便会乐淘其中,舒心而开怀。说起材质和质地,更是精巧难寻。很多人都是知道和田玉、岫玉和独山玉,这非脂非翡的梅花玉,便稀少而奇绝了,温润滑腻的清代梅花玉茶盏,自然成为稀珍之物。

据文献记载,早在商周时期梅花玉就已经被开采利用,汉光帝时期盛极一时,后因战乱被埋。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,在河南汝阳重新被发现,梅花玉得以重放异彩。

梅花玉又叫汝阳玉,产自我国河南洛阳汝阳县上店镇,为我国特有的玉石品种。史载汝州有三宝:汝石、汝瓷、汝帖。汝石又称汝州玉或梅花玉,梅花玉因其独特的个性,当属玉之精品。

梅花玉是我国奇特的玉种,一种美丽的观赏玉石。其底色多为黛青,也有褐红色、灰绿色。通体分布柳绿、鹅黄、褐红、梨白、绛紫、孔雀蓝、竹叶青等十余种色彩构成的梅花图案,故称梅花玉。其细腻温润,光泽明亮,半透明或不透明。天然花纹,如烟如霞,晶莹剔透,斑驳绚丽。有的梅丛中还隐约可见鱼、虫、蜂、蝶、鸟、兽等物象,可谓诗情画意,奇巧多姿。

梅花玉实际上是一种杏仁状构造的安山岩,由火山喷流出的岩浆冷凝而成。由于岩浆中压力的骤然降低,岩浆在冷凝过程中,包含在岩浆中的大量挥发性气体逸出后,形成了许多奇特形状的气孔。这些气孔被多种矿物质所充填,就形成了杏仁状构造。矿物质主要是石英、长石,还有绿帘石、绿泥石、方解石等。这些矿物质还会沿岩石中的裂隙充填而形成细脉,穿插于玉石之中,或绕过杏仁体,或切过杏仁体,这些细脉把多色的杏仁体连接起来,酷似腊月的梅花,梅花玉由此形成。

梅花玉是一种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玉,它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物质,含有铁、钠、钙等48种对人类有益的微量元素。长期佩戴其开发的多种产品,可以滋养身体,对人体起到一定保健作用,因而广泛受到人们喜爱。

春秋时期盘踞于正宁境内的小国——罗国

□ 师正伟

罗国是夏商时代半部落穴熊的一个分支,和荆楚同祖。大约在殷高宗武丁时,半族系诸部落遭到殷的征伐,罗便随楚由罗山(河南罗山县)迁避到甘肃正宁境内。以后又被周王朝讨伐,随楚国迁于湖北房县和宜城。到了春秋初期,被楚所灭,其遗民迁于枝江,后来又被迁至湖南汨罗。

罗,是祝融氏吴回之后,也是荆楚的一个先祖半姓首领穴熊的支裔,所以也姓熊,与楚国之后改姓熊,属于同姓同祖。秦嘉谟所补辑的《世本》云:“罗氏,本自颛顼,末胤受封于罗,国为楚所灭,子孙以为氏。”(注:“案《秘笈新书》引《姓纂》,以罗为祝融氏。”)《姓苑》也说是“祝融氏之后”,《姓氏急就篇》则就“罗氏,颛顼后。”《通志·氏族略》:“罗氏,子爵,熊姓,一曰祝融之后。”本来祝融是颛顼之后,更说明罗系颛顼系祝融氏吴回的后裔,和荆楚同一祖系。

到了商代,殷高宗武丁等历代君王,大肆征伐属于夏朝的残余势力——荆楚,罗是荆楚的分支,自然也遭到同样的打击,便随着荆楚部族躲避而西

迁。当荆楚迁到今陕西渭水流域的荆山、楚水叶,罗人也迁到楚北面罗山、罗水,即今甘肃正宁县东20里的罗山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五十七载:“(正宁)县东二十里有罗山。《寰宇记》:罗川水出罗山下,隋以此名县。”《清一统志》卷二百三载:“罗山,在正宁县东二十里。”又载:“罗水,在正宁县南,西南流入宁州界。《元和志》:隋,罗川县,以县南罗水为名。”白眉初《秦陇羌蜀四省志》载:“罗水出于午岭,西流至峡西县会泾水。”罗山,系于午岭西来的一条山脉,正位于陕、甘界上。子午岭之北有直罗川。由于罗人迁居于此,这里的山和水都以罗为名,罗川之上还有叫罗川务的地名。后来,隋朝便因罗川之名,建为罗川县。这个罗山、罗水,正靠近周部落的祖先庆节居住的邠地的北邻,他们都属于夏族的体系,共同联合以抵抗商人。据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记载十巫中有巫罗,当系罗国的首领,又是巫师,与巫彭相近,巫彭到了西方,今彭水(甘肃庆阳南古彭阳县)一带。到了周武王灭商时,才封罗为子爵,正式成为周的属国罗子

国。到了春秋初期,正值楚武王国力强盛,楚向汉水以东和以北发展势力,罗国首当其冲,便遭楚国不断的侵袭。《左传·桓公十二年》(公元前700年),楚国派兵征伐罗国,“楚师分涉于彭,罗人欲伐之。”(注:罗国在宜城西山中。)次年春,楚屈瑕伐罗,……(师行)无次,且不设备,及罗,罗与卢戎两军之,大败之。莫敖缙于荒谷,群帅囚于冶父。”这次罗、卢两国乘楚以大国自骄,座靡无备,夹击楚军,把楚国打得大败,主帅自缢,其余将领被俘,使楚国损失惨重,可见当时罗国的势力还很强大。但因楚毕竟是个大国,“其后,楚复伐罗,并其国,子孙以为氏。”罗国被楚所灭,时间约在公元前690年,楚武王伐随之前。否则,楚国决不能越过罗国去攻打随国,也不能越罗国去攻打随国,也不能越罗国去攻打随国。所以,楚灭亡了罗国之后,完全控制了汉水交通要道,为吞并汉东诸姬和北向中原,打下了巩固的基础。

对于罗国的灭亡原因,据富辰谏周襄王说:“昔郢之亡也由仲任,……罗则季姬,……是皆外利亲亲者也。”(注:季姬,姬氏女,为罗夫人而亡其国也。……外利,行满腔热情借求利于外,不能亲以亡其国也。)”这个季姬,很可能是汉东诸姬国君的女儿,与罗结婚含有共同抵抗强楚的目的。至于把罗的亡国原因,归咎于季姬这个妇人,未免过分。但罗子胜楚而骄,发展为骄奢满腔热情快,不能团结群众,却是亡国的主要原因。

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史

□ 周铁钧

1925年10月,中共中央派蔡和森赴莫斯科出任驻共产国际代表,他与夫人向警予抵达莫斯科后,受到中国共产党旅居莫斯科支部(以下简称“旅莫支部”)的热烈欢迎。

“旅莫支部”1923年4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建立时有党员23人,罗亦农任支部书记,党员们除学习东方大学的课程外,要每周聚会两次,研讨马克思主义理论,探索中国的未来和革命斗争方法等。

蔡和森与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,两人曾共同组建“新民学会”,创办《湘江评论》。他曾与李达、李大钊、张太雷等人一起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,组织反抗封建统治活动。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,他多次致信毛泽东、陈独秀等人,提出“只有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,才能消灭剥削压迫,拯救中国,改造世界”,他1921年底回国后入党,负责舆论宣传等工作,熟知党的发展历程,方针路线等。

在东方大学餐厅举办的欢迎晚宴上,罗亦农恳请蔡和森为“旅莫支部”做一次关于党的

历史与发展、形势和任务的报告,满足同志们因旅居国外,极需丰富党史知识和了解党的发展壮大、斗争情况等。

蔡和森应邀请后,连续几个不眠之夜,拟定了报告大纲,从1926年底开始,为“旅莫支部”全体党员作报告,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讲到1921年的南湖红船;从“五·四”运动爆发讲到领导工农、学生运动;从党的“二大”“三大”“四大”讲到党的责任使命、发展方向……

每次报告过后,向警予都把记录重新誊写,待全部讲完,已整理出厚厚一摞,夫妇二人又几经删修、充实,最后完稿5万余字,定名《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(提纲)》(以下简称“党史发展”),在莫斯科油印成册,发给“旅莫支部”党员人手一册,后被带回国内,开始在党内流传,从那时至今,被公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史。

“党史发展”开宗明义地讲道:“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如何?只研究俄国党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,我党虽成立不过几年,但已有了很多复杂的事实,值得我们研究。要做一个好党员,忠实的无产阶级先锋队,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,必须深刻地知道党的历史。”同时也指出:“研究党史不是只研究哪一步,而是研究全部,不是研究个别细节,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。”

蔡和森的“党史发展”评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,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,不单单就史说史,以事论事,而是将党史放置在全国的大框架上考量、论证,他首次提出“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”“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”等论断,充分肯定了“党引导无产阶级由经济罢工直到政治斗争”“领导一般群众进行民族斗争”的功绩,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唤起大众觉醒,领导人民运动、建立统一战线,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,为引领党的正确导向,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发挥出重要作用,也为党史学的实际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,对今天学习、研究党史具有无可替代的借鉴、指导意义。